

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发展研究新进展

曹洪军 任 铭

2019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前沿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管理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3月29—31日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产业与科技史研究》编辑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省管理学会承办。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南工业大学、聊城大学等2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旨在回顾当代经济史学科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总结学科发展经验,把握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统一,拓宽研究视角,突破研究时空限制,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现代经济史发展研究热点与难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与会专家学者从2018年学科前沿动态与热点、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发展成就与经验、70年经济管理创新与发展等三个层面进行了研讨。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既可追溯经济发展历史规律,又能为当代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指导。

一、2018年学科前沿动态与热点

董志凯综述了2018年改革开放史研究进展,指出:讨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是2018年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突出亮点,研究涉及多个阶段、多个产业与多个区域,并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密切关联。她认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验,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中,以不同的方位或视角认识这一历程,深刻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共识凝聚与道路选择。

贾子尧、郑有贵报告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包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挖掘整理史料的基础性研究和量化史学研究等方面。温锐、李孝文回顾了“文革”经济史研究,评述了十年前“文革”经济史研究现状与近十年研究的新拓展与新内容。毕学进、毕学成基于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趋势与展望进行了研究,并从研究阶段、断代与区域、研究内容等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探寻中国经济史研究热点、前沿及其趋势变化,对于把握研究方向,厘清学科演变规律,推动经济史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专题研究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学者们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层面作了深入探讨。李昕、曹洪军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与实践,研究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许多重要的时代特征。李文探讨了城乡统筹发展问题,指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硬币的两

〔作者简介〕曹洪军,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创新与环境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266000,邮箱:hongjunsd@163.com。
任铭,中国海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青岛,266000。

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均以城乡统筹为核心要义,均以工业化为主导。

从具体的研究方向来看,赵学军着眼于当代中国金融史研究动态,从金融改革开放40年研究、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外汇与农村金融五个方面对当代金融史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李进伟择取当代中国环境史研究视角,概述了环保史、生态环境思想史、灾荒史、疫病史等多个领域的新成果,并指出史料挖掘不深、国际视野不足、微观研究匮乏、学科融合较浅等问题。戴吾三基于技术与经济紧密联系的角度,从长周期与指数时代发展切入,提出现代经济史应当关注技术的指数增长,关注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兴产业,并注意后进地区因发展数字技术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结合政治、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杨帆从中美关系的战略演变入手,揭示中美关系变化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矛盾统一。于文浩着眼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结合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2018年度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热点进行了回顾。

二、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发展成就与经验

汪海波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工业化步入中后期阶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我国跃上经济大国地位并向经济强国挺进,人民生活逼近全面小康巅峰。70年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理论与思想研究方面,程霖、陈旭东认为,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其在推动中国实现一个比较长时段的高速经济增长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通过对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发展变迁过程的系统梳理,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对启迪新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宋博从经济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入手,初步考察了经济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及其悖论,指出各国的金融发展应着眼于发挥金融化的积极作用,力避并治理金融化导致的新自由主义悖论。

在金融制度与政策研究方面,兰日旭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平稳发展必要的制度保障,并阐释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地位的确立并真正具有现代央行职能的曲折变迁过程。曲韵基于开放视角,从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双向投资”发展历程与演进,阐释了我国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和竞争体系的重要举措,亦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宋士云以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城商行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紧紧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重点,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路。

在上市公司研究方面,陈尚静荷指出,股权质押作为再融资的重要渠道,对于上市公司具有重要意义。她认为股权质押制度安排的缺陷,股权质押业务的顺周期性以及市场监管的滞后与默认,是造成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从流动性不足的缓解方式蜕变为股市系统性风险催化与引爆的重要原因。

在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韩熨华、瞿商对1998年提出扩大消费概念以来关于扩大消费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和评价,他们认为,截至2018年,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首,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中国消费结构开始进入新一轮升级期,居民消费逐步合理化;消费结构的升级和转化,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符合高质量的发展观。

三、70年经济管理创新与发展

经济史研究既可追溯历史经济规律,又能为当代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指导。在经济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新理论、新视角与新方法层出不穷,成果丰硕。与会学者就不同的研究专

题,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突破研究时空限制,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史学科研究动态、热点问题与难点问题。

在改革与发展研究方面,张吉、王年咏认为,履行“入世”承诺、扩大金融开放,是2002—2008年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构成,他们从研究背景、改革历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2002—2008年金融改革进行了初步考察。财政改革是社会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和保障性作用,冷功业通过回顾和总结财政体制改革70年的风雨历程和经验得失,对财政体制改革发展的未来提出了方向和思路。

在思想与理论的研究层面,王学庆从“关键改革”、决定性人事任免、“十一大”对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等方面,讨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起点问题。姜长青阐述了刘少奇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论断。刘巍基于近现代“总供求态势”视角,研究中国总供给曲线的统计描述与逻辑分析,辅以美日各阶段经验证据,提出主流经济学对总供给曲线的推断存在一定偏颇。

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张连辉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演变为主线,分阶段系统考察了中国协调城乡环境关系的探索历程,指出应当历史地看待城乡环境关系协调工作的形式与绩效,更多地从调整城乡经济关系政策入手进一步提高城乡环境关系协调工作的绩效。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冯兵兵对1958—1965年中国农田机电排灌的“跃进”、面临的危机与困境、全面整顿政策的出台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等方面进行阐述并总结了其历史经验和深刻启示。王丽、瞿商对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研究的共识与分歧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后续农户超支问题研究的突破点和应当进行进一步探讨的诸多问题。常明明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探讨了人民公社制度变迁与农民经济行为的互动,并进一步揭示了人民公社制度兴衰的原因。易绵阳以20世纪70年代萧山县社队企业的经营实力、经营范围与经营绩效为研究对象,指出社队企业的大发展,极大地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提高了服务农业生产的能力,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张丽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学术性研究中指出,决定学术研究质量的更多是学者的学术品格和学风。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对经济管理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彤新春从企业发展思维的角度,提出应当客观审慎地分析国有、民营企业在新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展望涵盖国有、民营及各种所有制的中国企业在历史进步中的责任和担当。李飞龙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贵州民族地区的租佃关系与减租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租佃关系的复杂面相与减租问题。汤可可、王海宝回顾和总结了无锡电影胶片厂技术范式及其转型的历史进程,对于认识技术进步的内在规律、更好地揭示中国工业化赶超发展的路径和轨迹具有重要意义。黑广菊通过对“中华老字号”研究的梳理和评述,指出“中华老字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朱海城通过对浙江典当业进行长时段考察,系统梳理其历史发展历程,考察归纳了浙江典当业的变与不变。王瑞芳对传统以泄为主的治水思想向现代以蓄为主的新治水思想转变的历史进程进行了阐述,提出治水思想的正确与否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必须把握好继承、创新与发展的关系。

(责任编辑:王姣娜)